

中国文化在日本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严绍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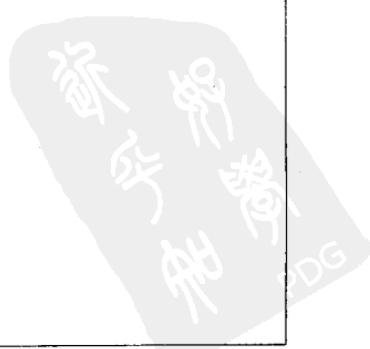
新华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

中国文化在日本

严绍璗 著

新华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

京新登字 110 号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中国文化在日本

严绍璗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中国印刷公司监制

北京志诚文字图像处理新技术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顺义李史山胶印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825 印张

插页 2 张 110,000 字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10,000 册

ISBN 7 5011 · 2382 9/G · 891

定价：7.75 元（软精）

2.80 元（平）

PDG

序

季羨林

最近几年来，有关方面的人士提出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立即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甚至海外华人和华裔的同声赞扬和热诚响应，足证这个口号提到了人们的心坎上，是完全正确而且及时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所有正确的口号都必须落实到行动上，才算有效。因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和中国华诚集团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李生泉同志等，爱国不敢后人，也想尽上自己的绵薄，为这宏伟的盛举增砖添瓦，几经酝酿磋商，发起了这项《神州文化集成》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中间也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计划先出一百本，并将配以电视录像。读者与观者，不限于大陆上的同胞，也包括大陆以外的华人和华裔；台湾在内，自不在话下；我们甚至想象，连在历史上同文化交流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都包括在里面。至于这个范围以外的世界上所有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如果对我们的丛书和事

视也感兴趣，我们当然也衷心欢迎。“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就是我们的期望。

抱着这种想法和期望，我们开始了组稿活动。在较短的期间内，我们约请了一些国内学有专长的老中青年的学者，承担各书撰写的任务。尽管有不少学者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一听到我们发起的宗旨，无不慨然应允。为了保证著作质量，我们规定了严格的审稿制度。谁也没有“特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弘扬我们先民留下来的优秀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观众。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最初我们想定名为《神州文化精华》或者《精粹》。但是有的同志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上来看，我们中华文化，不管有多么光辉灿烂，不管对全人类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它同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的文化一样，并不可能完全都是精华。我们的丛书中也介绍了一些非介绍不行的反映中国特殊文化的现象，它也许谈不上什么精华，但也绝非“毒品”，它似乎是中性的，绝对无害，也许还有点益处，它能增强国外读者和观者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把本丛书命名为《集成》。

我们的丛书虽然冠以“神州”，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却绝不限于神州。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如果说我的考虑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我并不囿

于神州这一个地区，也不限于当前这一个时代。我收藏着一方清代浙派大家陈曼生刻的图章，其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完全符合我的精神。我于文化问题绝非内行里手，我也不装出这番模样。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想到了一些东西，我不愿意妄自菲薄，也不愿意敝帚自珍，于是就写了一些短文，在不同的座谈会上也做了几次发言。得到的反应多是肯定的。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例外。这当然增强了我进一步探讨的信心。

我觉得，我们过去谈论中国文化，往往就事论事，只就中国论中国，只就眼前论中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像瞎子摸象一样，摸不到全貌，摸不到真相。经过我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被、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美。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

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

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东方文化；而要想了解东方文化，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了解必须同时并进，相互对照，相互比较，初时较粗，后来渐细，螺旋上升，终至豁然。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意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

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不清不楚”,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这同我上面讲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是完全一致的。

我的这一点想法,颇得到一些学人的赞同。在北京召开的“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我的看法。会议结束以后,一位日本大学教授专程来到我家,向我表示他很赞成我的意见。我最近到南朝鲜访问,在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又谈了我的看法,一位大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教授说:“我们韩国没有东方文化!”我在大吃一惊之余,举了几个我在汉城几所大学中看到的例子,说明那里是有东方文化的。那位教授最后还是承认了我的看法。

但是,不管有多少人赞成我的想法,我毕竟不精于此道。亿而偶中,是可能的;亿而不中,又何尝不可能呢?我这一点粗略的想法,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

用实践来证明。即使在非常长的时间内，也只能逐渐地通过世界文化的发展来验证。这一点我想是大家都同意的。

一个人自己有了一点新的看法，而且又觉得它是可能站得住脚的，总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得到赞成，当然高兴；得到否定，也可以起他山之石的作用。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一有机会，就宣传我的“上帝”。现在就是借写这篇序的机会，再絮叨一遍。

我这一篇所谓总序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绝无意强加于人。强加于人的作法是愚蠢的。百有争鸣，我只是一家。但有一点我是十分坚定的，看中国文化，必须把它放在东方文化这个大框架内，放在世界文化这个更大的框架内，才能看得清楚。如果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能放开眼光，囿于积习，墨守成规，则对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无论如何也是认识不清楚的。弘扬中华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的责任。我们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和电视录像的制作者，都会认真负责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我希望，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我希望，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序	季羨林
前言	1
第一章 日本的发现	3
一、远古时代中国先民的东方观念	3
二、“岛夷”的活动与孔子欲居海外	5
三、《山海经》与《论衡》中记载的“原日本人”	8
四、邪马台国与卑弥呼女王	13
第二章 神话世界中的中日文化融合	15
一、中日神话的类型	15
二、中日神话中“二神创世”的比较	21
三、中日“物崇拜神话”的形态	29
第三章 徐福的传说	35
一、徐福传说的起源及材料	35
二、中日古代海事文学中的徐福	38
三、徐福传说的展开	40
四、徐福传说的真正的“根”——从传说到事实	42
五、徐福传说的整合——从事实回返传说	45
第四章 奈良·平安文坛上的中国文化	49

138178

一、日本最早的书面文学集《怀风藻》.....	49
二、《万叶集》中汉文学的痕迹.....	53
三、平安文坛上的唐人传奇《游仙窟》.....	57
四、《竹取物语》与中国文化.....	60
五、《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化.....	70
第五章 五山汉文化	79
一、五山文化的范畴.....	79
二、五山僧侣儒佛互补的理念.....	82
三、五山汉文学.....	84
四、五山汉籍刻版印刷事业.....	88
第六章 江户时代的儒学	95
一、藤原惺窝·林罗山与朱子学派.....	95
二、了庵桂梧·中江藤树与阳明学派	103
三、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与古学派	108
四、商界的儒学修养	118
第七章 日本近世通俗文艺与汉文化	121
一、“假名草子”与明人传奇	121
二、日本前近代型小说与明清话本	129
后记	李生泉 143

前 言

郭沫若院长在庆贺中日邦交恢复时，曾作有《沁园春》一首。其上阙曰：“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首，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

这首词从总体上概述了中日两大民族之间渊远流长的文化联系。此种文化关系，曾经把中日两国置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圈内，从而对两国文化的发展，给予了深刻的影响。这是亚洲及世界文明史上一个独特而又伟大的存在。它的影响至今仍然活跃着。因此，“中国文化在日本”这个课题，具有自上古以来一直在流动着的丰富内容。

考虑到本课题是在“文化”上做文章，因此，对古代中日两国一般关系的研讨，都阙而不论了。即使是“文化”关系，本书也仅止于日本前近代社会。此后的文化关系，应有另一册书专门研讨。在古代漫长而又生动的文化联系中，著者选择了若干侧面。读者通过这些问题的研讨，如果进一步理解了古代中日文化联系的本质特征，进而有益于当代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理解，这便是著者的最大愿望了。

严绍璗

1993年8月于北大跬步斋



第一章 日本的发现

一、远古时代中国先民的东方观念

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出现了古代最早的一部字书《尔雅》。这部字书的作者，一说是协助创建周王朝的“周公”，一说是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学生。这部书第一次叙述了当时的中国人对中国四周的地理观念。称北方为“觚竹”，南方为“北户”，西方为“西王母”，东方为“日下”。其中关于“日下”，作者说：“日下者，谓日所出处，其下之国也。”

在古代汉语中，“下”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表示“从高处到低处”，与日语中的“Sagaru”、“orosu”等同义，属于“动词形态”。另一个意思是表示“所处的位置在下方”，与日语中的“moto”、“shita”等同义，属于“名词形态”。《尔雅》中“日下”的“下”，属于第二类意思的“方位词”。所以，“日下”就是“太阳之下”，而不是“太阳落下”。如是，《尔雅》的这一表述便可以得到顺理成章的解释。它的本意是说：所谓“日下”，指的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即太阳（照耀）下的一个“国家”。这是远古时代中国先民最早表述的东方地理观念。《尔雅》的这一记载，在当时并不一定是确指今天的日本列岛，它更多地是表示了中国古代先民关于太阳的奇特的幻想和对于东海的神奇传说，从而构成了独特而神秘的东方观念。

尽管如此,但是,由《尔雅》提出的“日下”与以后“日本”的定名,却具有密切的关系。

日本在飞鸟时代之前,关于自身的国土和人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确定的名称,“记纪神话”中称为“大八岛国”、“大八洲”、“苇原中国”等,后来又接受了中国古文献中“倭”的称法。七世纪时代,日本开始确立律令制国家体制,形成古代国家,并开始定名为“日本”。

“日本”的“本”即“Moto”,意为“太阳的故乡”。日本人依凭什么,把自己生活的土地称之为“太阳的故乡”呢?地球运动的知识告诉我们,人类对于太阳升降的感受都是一致的——即太阳从东方升起,向西方降落。站在地球任何一个固定点上,都只会感受到太阳的故乡在遥远的东方。决不可能感受到“太阳的故乡”便是自己的站立的这一方土地。这一点,古代日本人当然也不会例外。因此,“日本”这一名称的意义,在最初的时候,一定不是日本列岛居住民的意识,而是观察到太阳从东海中升起的,即日本西方的居住民意识。可以这样说,“日本”这一名称,与《尔雅》中表述的“日下”这一观念,具有极为深刻的内在联系。实际上,《尔雅》中“日下”的真正含义,便是“日本”的意思。六、七世纪时代的日本的贵族阶层,接受了《尔雅》中所表达的古代中国人最原始的东方地理观念,把它作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国家和人种的名称。

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在形成中,确定“日本”这一国名与“天皇”这一称号是一个历史过程,从中可以显现出《尔雅》的东方观念对日本最高层知识分子心态的影响。日本天皇在确定正式使用“天皇”名称之前,曾自称“大王”、“天子”等。公元六〇七年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大臣小野妹子携带“推古天皇”

(这是后世的称呼)致中国隋代皇帝的“国书”。开首这样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这句话很有意思。前半部分“日出处天子”是日本国王的自称，文句中的“日出处”，明显地来自《尔雅》中“日下者，谓日所出处”，使用的是中国先民的东方地理观念，不然就无法解释“日出处天子”的意义。此句后半部分“日没处天子”，指中国皇帝，这里表述的是日本人的西方地理观念，认为中国便是太阳西落的地方。站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皇帝，他只能理解“日出处天子”的意义，却不能理解“日没处天子”的意义。因为从他的地理立场来说，太阳是落在了中国的西方了。“日没处”是当时日本高层知识分子仿照《尔雅》中的“日出处”所构筑的自己的西方地理观念。这一封国书的开首称谓，表现了《尔雅》表述的中国先民最原始的东方观念在六、七世纪时代对日本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指“日本”这一名称，是从“日下”引申出来并得到确认，是并不过分的。这是《尔雅》表述的中国古代先民原始东方观念的最大价值。

二、“岛夷”的活动与孔子欲居海外

中国上古时代记载有关日本列岛的知识的最早的文献，应该推断为《尚书·禹贡》。关于《尚书》编纂的时代，学术界历来很有争论。我们把它推断为秦汉之际的作品，大部分材料取自先秦，这大概是比较合理的。《禹贡》为《尚书》中一篇独立的地理学著作。相传它记录的是大禹时代华夏族的地形、山川及田赋的状况。司马迁就很相信《禹贡》是夏朝时代的资料，他的《史记·夏本纪》几乎全文抄引《禹贡》的文字。但是，事实上

“禹”是传说中的人物，如果从《禹贡》所反映的地理观念来看——北起冀州，南至衡阳，西自雍州，东抵大海，这显然是战国时代政治活动的区域。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禹贡》是战国时代（公元前五世纪——前三世纪）的著作，比较符合情理。在这一篇著作中，有两处记载透露出了中国古代先民关于日本列岛的最初的知识和观念。《禹贡》曰：“冀州……岛夷皮服，挟右碣石，入于河。扬州……岛夷卉服，其篚织贝，其包橘柚锡贡。”这是关于中国与海东居民关系的最早记载。

从殷周开始，华夏族关于域外四方居住民的基本概念，习惯上采用“北狄”、“西戎”、“南蛮”、“东夷”的称谓。最早的“东夷”，无疑指的是今天江淮流域一带的居民。但是，自春秋后期之后，江淮流域已经逐步得到开发，吴、越、楚等诸侯国都曾强大一时。从此时起，中国古文献中关于“夷”的观念，与殷周的“东夷”的观念在内涵上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随着江淮地区的不断开发与海上交通的发展，上古时代中国人的地理知识也逐步扩大，这时所谓的“夷”与“东夷”，主要是指海外居住民了。

从《禹贡》所指示的方位看，它所记载的“岛夷”，指的是公元前五世纪至前三世纪前后，活动于我国河北之东大海之中，与浙江之东大海之中的域外人种。他们分别从冀州（今河北）一带，与扬州（今江苏）一带分南北两路，登陆上岸，进入我国境内。华夏族习惯上把他们称之为“夷”。此种“夷”民，考之战国时代的地理观念，再参证我国有关的古文献资料，可以判断，他们大致是日本列岛上的先民（Proto-Japanese）。《禹贡》的记载，表现了上古时代中国对日本及其先民的一种最原始形态的观念。